



那棵被生命滋润的“枯树”

——评内蒙古“金鸡奖”影后巴德玛新片《脐带》

■ 苏芯冉 李树榕

由坏兔子(上海)影业有限公司、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阿那亚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等联合出品、巴德玛主演的《脐带》，是一部关注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故事片。该片在令观众揪心、扎心、痛心的些许无奈中，又饱含着血缘亲情的浓浓温馨、往事回忆的美美陶醉，以及母子俩一同寻找那棵“一半已经枯死，一半依然旺盛”的“奇迹之树”的执着和期待。由此，痛、盼、知、悟，便构成了观众连接式的心路历程。

痛

现实中，一些人的父母、祖辈有患阿尔兹海默症、帕金森综合征的，还有一些人的配偶或子女患有自闭症、抑郁症和焦虑症。而阿尔兹海默症，作为神经系统的退行性疾病，在85岁以上的老人中竟占很大比例：他们或完全失忆，或不能自理，或严重失语，或大小便失禁……亲人们将财力、精力、心力耗费了许多，最终得到的却是“无力回天”的伤痛。而且是不能彻底治愈的。《脐带》正是聚焦在这样一个人类共同面对的“难点”上，试图唤起人们对生命的哲学思考和深切感悟。

影片中巴德玛扮演的母亲娜仁左格，就是这样。犯病时，她会把尿涂在自己和大儿子脸上，会跑出去后迷失方向，进而随时有丧失生命的危险；她还会往自家墙上涂抹各种色彩，衣着不整，毫无尊严地到处乱跑；更甚者还把邻居从楼梯上推下去，致使对方摔伤……大儿子要上班，孙子要上学，儿媳要照顾，当他们不得不把母亲锁在一个卧室里时，观众的心就像被扎了一样，生疼、生疼的。怎么办？因而，我们看着银幕上那位时而慈祥地笑着，时而忘我地跳着，时而无故发火的老母亲时，观众油然产生的“痛”，就是第一个永远难忘的感受！

盼

小儿子阿鲁斯在北京以马头琴的高超艺术水平，获得了观众的认可，事业红红火火，粉丝越来越多。孰料，远在家乡的妈妈病了，严重地影响了住在镇子上且经济并不富裕的兄嫂和侄子的生活。当他看见锁妈妈的铁链子时，听到妈妈半夜发出“我要回家！”“我要回家！”的喊声时，他决意丢下工作，接过哥哥的重担，带妈妈回到她日思夜想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由此，观众的“痛”在慢慢转变，一个“盼”字，成了无言的期待。

古人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感人的音乐是真切的心声！儿子要唤醒妈妈记忆的情感真挚而深刻，所以，时时处处事事，他都竭



心尽力地照顾母亲。他既像一个医生，用照片、破旧的马头琴、合身的蒙古袍，极力帮助妈妈恢复正常思维，又像家长，看见跑到湖边的妈妈在“幻听”中舞蹈，便担心妈妈落水。看见离家出走、昏睡在树林中的妈妈，他便担心妈妈生病；看见蒙古包里迟迟不醒的妈妈，他又担心妈妈是不是已经离世……担心、监护，是妈妈的失忆和“神经系统退行性病变”造成的，作为音乐家，儿子能否用自己创作的曲调——无论是马头琴、电子琴还是口弦琴，治愈妈妈的疾病呢？观众无不猜测着、期待着、盼望。尤其是当观众看到儿子能够将摩托车的发动声、树林鸟鸣的叫声、水的波浪声都合成音乐时，“盼”就成了大家最热切的情绪。

知

当然，影片另一个不能忽略的感奋点，是怎样破译失去理智的人时常闪烁的“意识密码”。而巴德玛的出色表演，却总是让观众看到像儿童一样天真无邪的笑容，此刻，妈妈想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正常人只会在形象思维时，才会在脑海里“过电影”，而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娜仁左格母亲由“幻视”“幻听”等“幻觉”形成的合力，究竟该如何通过影像的途径揭秘呢？我们能够感觉到，主创人员一定是非常善良的，他们不忍心用恐惧、苦难、孤独的幻觉诠释妈妈的潜意识，而是在老人离开正常人的思维轨迹时，让妈妈多次“走进”的是昔日美好的时光。而老人家执拗要去寻找那棵“一半枯死，一半茂盛”的奇树，就是美好情感的寄托和仅有的幸福“记忆”。

有人说，这是一部“公路片”，其实不然。因为儿子驾驶着三轮摩托车，带着母亲和简易的家当，为“寻找奇树”而飞驰于草原的公路和森林中的小道上时，观众会感受到“寻找”的带入

感太强了，这是儿子在寻找激活母亲记忆的途径？是在寻找母亲刻骨铭心的一个“诺言”？还是在寻找象征“生与死”之间关系的那个答案？抑或是寻找母亲曾在树下留下的欢声笑语？而这一切，都源自于剧作者欲与观众“共情”的智慧和担当。

无可否认，生活中，所有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家人，都在不懈寻找治愈患者的途径。然而，老人一旦精神出了问题，他（她）们脑海里的“黑匣子”究竟该怎样破译，他们是在想“好事”还是在想“坏事”，他们是否会有极端的危险行为？人们是不知道的。但是，《脐带》的主创人员，却在矢志不移地努力，努力用艺术想象、审美联想、通感转化，借助于巴德玛糊涂中有清醒，清醒中有糊涂；时而“听话”，时而任性的表演，尽量做出具有相对正确价值立场的阐释。让母亲可笑、可爱、可恼，却不可恶、不可恨、不可怜。真是难得！贵哉！

悟

无论片名还是故事情节，“脐带”就是一个象征，是用有限的形象（符号）表现无限深刻内涵的美学手法。当我们作为生命的个体，独立于世界的那一刻，剪断的是与母亲血脉相连的“脐带”；当母亲不能独立于世界生活下去时，我们就应该还原与母亲血脉相连的那根“脐带”。那根在很多镜头、很多桥段中出现，链接儿子与母亲的宽宽的牦牛绳子，是一个多么绝妙的象征啊！它赋予了母亲自由行动的快乐，也保障着母亲踏实生活的安全。

虽然《脐带》讲述的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故事，却蕴含着一个深刻得不能再深刻的哲理。我国古人曾强调“熊掌和鱼不能兼得”，德国哲学家康德也指出：“两个同样正确却互相排斥的命题之间构成的矛盾”就是两难选择，就

是二律背反，就是“悖论”。影片中，让妈妈恢复健康，进而有质量地活着，是儿子的亲情与责任使然；但，儿子健康活着，是要活得有质量——既要是社会对自己的需要，也要让社会能满足自己的需要——这就是生活的质量。因而，月光下、篝火旁、河水边、蒙古包前，儿子一旦沉浸音乐中，便如展开了双翅在幸福地飞翔；而一旦被那根“脐带”紧紧拽住，他又陷入了寸步难行的桎梏。由此不难看出，悲剧的根源往往就在两难选择！毕竟，阿鲁斯的青年年华是需要事业支撑，需要为社会做贡献，继而实现自己生命价值的。在“自古忠孝难两全”的悖论中，他应怎样度过每一个“明天”，都是观众与他一同思考的问题。虽然有人说：“尽忠，就是最大的尽孝。”那么，尽孝，就是最好的“尽忠”吗？儿子为难了，太为难了！照顾妈妈，就不能工作；去工作，就不能照顾妈妈。怎么办？影片的矛盾冲突就在渐进式推动中，试图做出更多的探索。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是规律，就不可能违背。当母亲在偶尔清醒时，为什么一定要儿子带着她行程万里去寻找那棵“奇树”？最终，母亲在幻视与幻听的“欢喜”中，自顾自地走向夜幕中那个“幻境”时，儿子为什么不再随着“脐带”的牵绊，再紧跟母亲的脚步？最终，为什么是儿子独自找到了那棵“生死相依”的“奇树”？影片结束了，观众却意犹未尽：“儿子还会继续寻找母亲，并把她带到树下吗？”还是“母亲一旦来到这棵树下，记忆力就恢复了？”抑或是“依照草原上古老的习俗，自知即将步入另一个世界的老人，会不辞而别地永远消失在亲人不知道的地方”？

一连串的困惑，将《脐带》紧紧缠绕着我们的思考，却没有答案。于是，观众被影片牵引着却进入到了人人几乎都摆脱不了的道德层面：“久病床前无孝子吗？”“你养我小、我能生存压力极大的情况下养你老吗？”而由此辐射出来的问题，关涉到医学科学的发展和社会保障的方方面面：既激励着怀有“仁心”的医者对阿尔兹海默症的攻破付出更大的努力，也让处于倒三角家庭结构中的中青年人思考：如何让老龄群体更有生存的安全感？一切的一切，就是这部影片留给我们最大的研究课题。为此，该片已入围第35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亚洲未来单元”，并在第四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上被授予“最佳技术奖”，是实至名归的。

■ 陈剑晖

塑造内敛而坚毅的父亲形象



尽管从古至今，回忆父亲的文章不少，但张培忠这部以父亲为主题的长篇纪实文学《永远在路上——一个农民的一生》，仍深深地打动了我，读来有一种“别样的”感觉。

这种“别样的”感觉，首先体现在“小历史”与“大历史”的共构上。历史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叙述历史一般有两种不同的路径，分别是“大历史”和“小历史”。“大历史”指的是那些宏大、全局性的历史，比如社会的沿革、历史的巨变，以及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等。“小历史”则是指那些局部的、常态的历史，比如个体性的历史，某地的历史，以及关于人们日常生活、喜怒哀乐、社会习俗的历史。“小历史”的微观取向可以让读者看到更生动、更具体、更富有个性的历史景象。这部作品就是从“小历史”的微观视角，以平实朴素、内蕴深厚的笔致，再现了半个世纪前后潮汕北部山区农村、农民的生活情状和精神状态。

在那个年代，面对生活的窘迫、命运的坎坷、现实的残酷，这些生活在潮汕地区的农民，凭借他们的孝忠信义、自强不息、永不放弃、永不言败的信念和生存智慧，艰辛但坚毅隐忍地前行。

而“我”的父亲就是其中的代表。为了让孩子们好好读书，为了温饱生存的尊严，他种田之余，还做小贩，当伐木工，长年“走山内”“走凤凰”“走浮山”。即便后来年纪大了，且身体有病，他也没有放弃“走山内”。这个父亲的形象既内敛隐忍又坚韧不拔，从中折射出既传统又勇于开拓进取的潮汕文化精神。作品通过父亲的一生和命运的改变，使得“小历史”的叙述落到实处，使得由这些普通人所构筑的“小历史”折射出时代变迁的“大历史”，也使得作品在“我”的亲历式和见证式的叙述中凸显出非虚构真实再现客观现实的基本品质。由于作者没有停留于琐碎的生活表象，而是以宏观的意识和宏大的视野，从“小历史”中见大社会，又从大社会出发理解“小历史”。这样，“小历史”因为具备了大视野，从而蕴含了大意义。

多维视角的透视，是这部作品有别于别的纪实文学作品之处。进入新世纪以来，人们已厌倦了大量胡编乱造、缺乏现实感的虚构作品，而渴望看到更接近生活真相，看到“比虚构更精彩的现实”。而“非虚构写作”的一个功能，就是以揭示秘密、寻找真相为旨归，从而能更好地满足读者的“真实性”的期待。但在新世纪，由于互联网的发达，加之现实生活的多元化和复杂化，只用单一的方式来记录生活、揭示真相，显然远远不够。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不仅通过报告文学的手法来写人叙事，还借助日记、书信、口述历史、现场图片、笔记图表、实物展示，以及亲友的评论等，力求多维度、全方位地介入现实生活，立体地展示一位中国农民的一生。这种多维视角的透视，复活了生活的原生状态，使作品更具在场感和画面感。这表明，张培忠不仅是一个“非虚构写作”的有心人，而且他一直处于文学的现场和前沿。

与多维视角透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是“深描”。所谓“深描”，原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术语，是相对于仅仅描述人的外在行为的“浅描”来说的。“深描”既指叙述的视角、立场与情感，同时也指作者在写人叙事时，更注重探讨和展示人物的外在行为背后的意识、动机、心理活动和精神诉求。就这部作品来说，它的“深描”有几个层次：

其一是感情的深挚。张培忠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必得心有所主，情有所归，其至道即在于孝，孝为第一要义。”因有孝，所以有忠，有义且有情。而这情，系于家乡的土地，系于父亲的来路和人生，系于父亲对“我”的点点滴滴。因渗透了父子的浓情，作品自然也就格外地真切深挚。其二是“深描”人物的内心世界。书中有不少关于父亲心理世界的描写，不仅十分真实，而且符合特定环境下人物性格的逻辑。其三是“深描”生活细节。大量鲜活的生活场景和大量毛茸茸生活细节的“深描”，正是作品具有丰富度的保证。而且，因为有“深描”，这部作品写的不仅仅是作者自己的“小家”，也是一个时代农村、农民的生活实录，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群体的“大家”。

(据《光明日报》)



歌海新探

——《鄂尔多斯民歌审美特征及文化内涵研究》序

■ 宋生贵

《鄂尔多斯民歌审美特征及文化内涵研究》是史永清的博士学位论文，经修改完善之后申请“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后期资助课题立项”获批。这表明，该成果到目前为止已经过“三关”检验，即：申请学位时严格的“外审”及答辩，申请项目时限量入围的评审筛选，出版社“三审制”的规范把关。作为学界中人，我明白这是三个硬关，都得靠成果本身做主；作为作者的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我则深知这一成果来之不易！

史永清是我被遴选为博士研究生导师后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生。后来还知道他喜欢写作。他希望我给他推荐阅读书籍，我给他开列了一份书目，并鼓励他保持写作的兴趣。的确，他一直在求学上保持着进取心，大学本科毕业后在高校从事声乐教学工作，期间考取上海音乐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继而在已经获得副教授职称之后又报考博士研究生。

攻读博士学位对于史永清来说，是重要的提升机会，同时挑战也在其中。他在大学本科和硕士研究生阶段的专业是演唱，良好的声音天赋，扎实的演唱功力以及训练有素的对音乐形态的把握能力，使他较早成为一位颇受学生欢迎的声乐教师与有潜力的青年歌唱家。读博的方向是民族艺术研究，这便需要他在自己原有的专业背景、知识结构与理论准备的基础上，大大地扩展学术视野，大量地阅读相关学术著作，自觉地进行文献积累，并且真正开始摸索既符合学科规律又贴近自己实际的治学方法。史永清显然是有备而来，他意识到了读博之难，但却总是满怀信心——至少没有在我面前流露出畏难之色。刚入学我便给他开列了一份书目，包括哲学、艺术人类学、美学、文化学等中外经典著作60余部，要求其必读的有30部，他欣然接受并表示认真去读。通过每周一次的读书报告，我可知他真的是下功夫了。读博一年后，他感触颇深地对我说，这一年的大量读书，好像渐渐地使自己的感觉与认识在发生变化！他还打趣地告诉我，他爱人说他这一年大量读书好像使整个人都有点变了。

大概这就是读书的魅力吧！所谓“润物细无声”般地潜移默化。

用以上文字写出我所了解的史永清的求学情况，一者是意在让读者认识写出这部书稿的是一位什么样的作者（当然我写到的仅只是他的一个方面），再者是拟以“知人论世”而来，接着循序介绍这部书的形成。以鄂尔多斯民歌为研究对象确定博士论文选题，这是史永清读博第二年即提出来的想法，我表示赞同和支持。鄂尔多斯享有“歌海舞乡”之美誉，其中蒙汉两种语言的民歌更是一座蕴藉尤丰的富矿。

民歌是鄂尔多斯“歌海”中的富矿。既是富矿，对之关注并付诸“开采”者自然会大有人在。面对他人的工作及已有成果，自己当何为？系统的音乐基础知识与训练有素的演唱水平，使史永清可以饶有兴趣且很自然地进入他的研究对象，在歌海中感受与玩赏；艺术人类学、美学、民俗学等相关学科的人文素养与理论准备，以及在读博期间学习到的治学方法，可以支持他在较为宽广的学术视野下分析与把握研究对象。当然，要真正开掘鄂尔多斯民歌这座富矿，有了以上两方面还不够。我们知道，民歌之根是深深地扎在特定的自然与人文土壤之中的，是一种具有浓浓乡土气息的生动鲜活的民间文化形式，是歌者对生命存在及意义的体认与表达。所以，研究者必须要踏上其原生地，双脚紧贴泥土，走到民间，走到歌乡，走进那里的生活，走进歌者的心田。生性厚道踏实的史永清是用了真感情，投了实功夫的。从读博第二年确定选题，到论文完成历时四年，他在不同季节、不同节俗，多次深入鄂尔多斯进行田野调查，搜集民歌曲谱，走访与结交民间艺人，参与当地的民俗活动，与牧民、农民歌手共同演唱传统民歌，获得“在场”感知及特定情境中的审美体验。田野工作所获得的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与真切的审美体验，使他对自己落笔成文有了底气和自信。他在论文的“绪论”中写下这样的感受：“田野工作是研究和写作的重要基础，有了扎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方可求得准确的判断。”是的，做学问、搞研究从来就是以务实为本的，不可有丝毫敷衍之态或讨巧之念。史永清并非“巧妇”，但其论文的写作还比较从容，应该说主要原因正在于此。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去完成这部约30万字的博士论文的过程中全部是顺风顺水，没有曲折，没有困扰，没有压力，非也！文章甘苦事，得失心自知。此中甘苦作者自己体会最深最切。我所知道的是正如前文所说，这一



成果来之不易！

有付出方有收获。这是合乎规律的正道。我们现在看到的《鄂尔多斯民歌审美特征及文化内涵研究》这部不仅手感不轻，而且学术分量也比较重的书，是史永清辛勤耕耘所得的一份重要收获。其付出印在字里行间的背后。一般来说，在这样的因果关系中，实践者会真切地感受到其付出的幸福感。我相信史永清也是如此。

从治学这个角度看，史永清还属于年轻学者。正是因为付出，使他在自己精力最为充沛的时候有幸游历于“歌海”，从中探珠求宝，识趣理思，进而有著书立说的自信。这是史永清在学术道路上跨出的重要一步，我为他点赞，同时更有新的希冀，期望他在学术的道路上继续脚踏实地向前走去。我知道这句话说来容易，但要落到处实委实很难。古往今来，治学是一条艰辛的路，要在这些道路上始终不离不弃，一往前行，除了要有学术理想，有执着的信念以及甘愿付出的精神之外，还需要勇敢，需要坚毅，需要涤除患得患失之念，尽量保持心中无尘，需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经得起失败与挫折，等等。也许正是这些原因，在这条说来不俗，看来也不无引人之处的道路上，浅尝辄止或半途而废者屡见不鲜，而坚守不移者却往往只是少数。不过，这也合乎一个古往今来大致不变的道理，即，可贵总是与难题连在一起，或者互为因果。

我撰写此文，如果说把这部书比作一个景点的话，我愿意做一名志愿者身份的业余的门外导游，为了少占用游人的观景时间，不影响其独立感受与判断，只是想粗枝大叶地介绍一些景点外围的东西，至于门里景致，留给游人自己去慢慢观看，自己去独自判断与评价。但不知如此定位妥当与否。

(《鄂尔多斯民歌审美特征及文化内涵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22年9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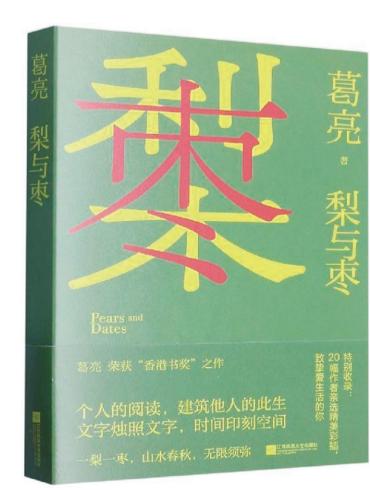


《梨与枣》

作者：葛亮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2月

《梨与枣》是作家葛亮的新随笔集，分“朵颐记”“谈艺录”“博物志”“东西引”“少年游”“挽歌行”“太虚境”“林下赋”等八个章节，关乎阅读，也有关写作所见。且以“梨与枣”的互勉尊重之意，致敬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据《西安日报》)

编辑：高翠清 李慧平 张文静 美编：晓行